于无声处听惊雷

——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 新华社记者 姜微 杨金志 吴振东 郭敬丹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

“这幅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一)“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石库门外,夜色之下,“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翻开《申报》,《粤桂最近之战局》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连载”,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国际上,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即将开幕。当日,报上一则《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消息,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乐观”——“舆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大为兴奋”。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二)“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6年后的1927年,那位曾经“眉头紧锁”的李汉俊、当时年仅37岁的李汉俊,倒在了反动军阀的屠刀下。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忻平说。

(三)“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胴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这是一个国运衰微、苦难深重的中国。

到底,路在何方?

191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

(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宣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徽省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政府“城墙坍倒办选举”“百余人轮流投票千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政何堪设想?”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党特别允许后可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的问题上,纲领在注释中留了个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

(五)尾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921年元旦,作家沈禹钟在《申报》副刊《自由谭》上发文“祝民国十年”,他语带希冀地写道:“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贰而心,毋逞小念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焉。”

同年岁末,同样是《自由谭》,作家许一鸥却忙不迭“送民国十年”:“你今年借了多少外债,丧失多少权利,替百姓增多少负担,也当交代个清楚,组阁组阁组了一年组出什么阁来。”字里行间,失望透顶。

他们并不知道,地火在地下奔涌,即将冲破地面;雨云在天边翻滚,即将炸响惊雷;晦暗在黎明前挣扎,一轮崭新的红日就要喷薄东方!

那幢石库门房子里发生的事情,除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骚扰外,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长条桌边的年轻人,文质彬彬,而内心火热,当他们起身没入人海,没人想到,一股红色激流就此改变了中华大地。

只有穿透历史的烟云,才能看清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那一扇并不宽敞的木门,开启了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壮阔征程;那一叶吃水不深的红船,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梦想。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应当缅怀,永远缅怀那些在沉沉黑夜中点燃火种、献身光明的人。我们更应自信,这个走过一百年的伟大政党,之所以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只因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看百年大党的理论自觉

○ 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去追,看似辽远的梦;去摘,遥不可及的星;去走,通向光明的路。于是,梦想照见现实,星辰照耀大地,人间不同往昔。

真理伴随新生,浸入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时间之河川流不息,甘甜的味道历久弥新。

(一)甘霖

百余年前,民族困厄,苍生落难。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三民主义……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求索,却撞得头破血流。

“诸路皆走不通了。”

黎明的前夜,历史等待擎火者。

1920年早春,浙江义乌的闭塞山村,阳光照进破旧的柴屋,29岁的青年陈望道,沉浸于翻译工作,不觉中,“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

半年后,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印刷出版,如闪电刺破暗夜,火种撒向人间。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久旱逢甘霖。

精神之甜、信仰之源,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革命先辈,送来了绝望中的希望,指明了蒙昧中的方向。

由此产生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二)信仰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它带来的,不仅是系统、科学、正确的理论体系,还有精神力量、价值引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铸了魂。

因有信仰,而生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立下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志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带领人民不断铸就去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业绩。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0001号文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临刑之际,李大钊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他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慷慨赴义,年仅38岁。他在《狱中自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无数革命者牺牲自己,却把光洒在后来者的身上。革命先驱的理想信仰,来自理论的坚定,来自真理的求索,来自人民的立场。

为了信仰,是可以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说:“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就是信仰的宣示。

历史沧桑,民心至上。人民,是百年大党的初心所系。从一成立,党就到基层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这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没有做过的。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恒定的目标,不变的初心,远大的抱负,坚贞的信仰,奋斗的自觉——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但是有了这些,求索的味道又怎能不是甜的?

(三)飞跃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结出甘甜硕果。

一个古老民族的容颜焕然一新且日新月异。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按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高高升起。新中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从一大时的50多名党员,到如今有9100多万党员的泱泱大党;从一穷二白发展成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旧中国,到消除人类最大的绝对贫困群体,走向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新中国;从封闭僵化、饱受欺凌,到海纳百川、拥抱世界,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嫦娥”探月、“蛟龙”入海、“天眼”巡空、“天问”探火……一代代中国人艰辛探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迈向未来步履矫健。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未如此之清晰。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四)前景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成功的实践样本,中国正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动力、厚植丰腴土壤。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大约30%,在新发展格局下,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有望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踏上新起点,未来无限。

到本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之时,也正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

彼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会更加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

彼时,最好的赞美仍莫过于——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从“汕头红”到经济特区

○ 汕头融媒集团记者 杨舒佳

20世纪30年代的汕头小公园开埠区华洋杂处,商贾云集,百业并存。位于海平路97号的“华富电料行”中,掌柜向顾客售卖电子管、灯泡等电料物品,会计在柜台熟稔地敲拨着算盘,穿着长袍大褂的经理时不时与朋友打打麻将……往来出入的人们不曾想到,这一切,竟是商业掩护下的“谍中谍”!

烽火岁月中,这个以电料行作为掩护,承担着为中央苏区护送干部、输送物资、传送资金、传递文件情报等重要任务的接头据点,便是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2019年修复落成的这处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座三层小楼以珍贵的实物和翔实的史料,向游客述说着那段“汕头红”故事。

绵延3千公里隐蔽战线的重要枢纽

步入“红色交通站”旧址,沙盘中红色五星标记下的一条中央交通线跃然眼前,香港华南交通总站、汕头交通站、大埔交通站、闽西交通大站等直属交通站清晰可见。这条绵延3千公里的隐蔽战线,是1930年秋冬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开辟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沟通着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系。始终未遭受敌人破坏的汕头站,正是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上重要的枢纽。

护送干部是当时交通站的重要任务之一。经多方考证,从1930年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经由汕头站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干部有200多名,其中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等。此外,交通站在前后三四年时间里,还向中央苏区输送食盐、布匹、药物以及电讯、印刷、军械器材等军需、民用重要物资约300吨。

2017年6月,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的修缮保护和布展工作正式启动,得到了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未来或有更多历史细节浮出水面

修缮一新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三楼展厅的一面大屏幕上,经汕头站护送的一批中共党员资料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参观者点击屏幕,便能详细阅读其生平故事。

沿着狭窄的木质楼梯来到二楼还原的洽谈室,记者看到一尊塑像,再现当年交通站负责人陈彭年与交通员商量工作的情景。房间里高档的桑枝桌上,摆放着潮汕工夫茶具和德国造的“竹竖笼”汽油灯,高脚茶几上摆放着烟灰缸和棋盘,颇显几分高雅。

“为了贴近上海商人的身份,当时电料行置办了比较像样的办公桌,还摆上算盘和文房四宝。”教育基地负责人张如强向记者介绍,由于当年保密要求,“红色交通站”既没有档案资料,又没有文献记载,这段历史记忆的“打捞”多是源自亲历者的口述。

相较于实物展品,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陈列的珍贵信件影印版及回忆录,以第一视角还原“卢伟良护送叶剑英”“李沛群护送邓颖超”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张如强告诉记者,学界关于红色交通线的口述史研究仍在持续,未来或有更多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

“红色名片”映照激情奋斗新征程

如今,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已成为汕头全新的城市“红色名片”,以一幅幅珍贵照片、一件件历史文物、一个个真实故事,展现着特殊年代里那些激情燃烧的故事。

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开放至今,开展了数场主题活动,随着这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被揭开,前来旧址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在这里,广大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了解党的光辉历史,学习先辈英雄事迹,在珍惜现今美好生活同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锤炼党性践行初心使命。

曾经,革命先辈们从这小小的交通站奔向救国救民之路,今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珍藏着这份红色记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不懈奋斗。

作为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汕头乘着改革开放东风,成为全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现在的汕头,正迎头赶上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活力特区、治理高效的法治城市、开放包容的文明窗口、聚侨惠民的和美侨乡、绿色宜居的智慧都市战略定位,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2021年1季度汕头市地区生产总值为628.06亿元,同比增长19.9%,首季GDP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全省,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短评】

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历史是一面镜子。精心修缮后的汕头“红色交通站”,带领我们穿过岁月的长河,在历史深处感受到隐蔽战线工作的艰难和危险,体悟到革命信念深入人心的智慧和力量。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历史给人启迪,更给人定力。那抹特别的“汕头红”,释放着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如炬光焰。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将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光荣传统,接续拼搏奋斗,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枝繁叶茂!